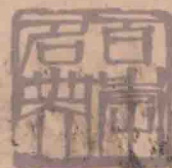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石泉 著



根浚葉茂 實亦聲滋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 石泉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石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9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1785-3

I. 古… II. 石… III. 历史地理—研究—湖北省 IV. K9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2299 号

责任编辑:李 程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1 字数: 442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785-3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宁津生	石 兢	刘经南
何克清	吴庆鸣	李文鑫	李平湘
李晓红	李德仁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易 帆	谈广鸣	舒红兵	蒋昌忠
樊明文			

秘书长 李平湘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韩 进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费成	方 卿	邓大松	冯天瑜
石义彬	余双好	汪信砚	沈壮海
肖永平	陈 伟	陈庆辉	周茂荣
於可训	罗国祥	胡德坤	骆郁廷
涂显峰	郭齐勇	黄 进	谢红星
韩 进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石 泉 (1918—2005)，原名刘适，安徽贵池人。1944年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进入研究院，师从陈寅恪教授，获硕士学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创办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要著作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云梦泽研究》（合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石泉文集》、《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主编）等。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1998年各一次）、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04年）等奖项。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 1963 年 11 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曾于1988年在我社出版发行，本次因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我社根据该版本，在力求保持全书原貌的前提下，对一些文字与句读的明显错误做了订正。此外，书中以“案”的形式，新增了石泉先生的若干批注。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目 录

自序·····	1
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	51
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	66
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	75
古邓国、邓县考·····	95
古竟陵城故址新探·····	115
云杜、绿林故址新探·····	143
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158
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证·····	182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 ——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192
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郢县故址新探 ——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	234

楚都何时迁郢·····	317
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	323
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	380
地名索引·····	459

地图目录

图 1	古“四渎”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65
图 2	春秋早期曾(随)、邓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94
图 3	巴、楚、邓、鄢位置示意图	111
图 4	古巾水、白水在竟陵附近合流入汉水图	121
图 5	古竟陵、云杜、绿林及相关地名示意图 (一)按流行说法	141
图 6	古竟陵、云杜、绿林及相关地名示意图 (二)按本文新解	142
图 7	熊渠三子据地(鄂、越章、勾亶)及楚丹阳、庸、 荆山(丹阳东)	173
图 8	关于楚都丹阳地望及相关地名示意图 (一)秭归说与枝江说	181
图 9	关于楚都丹阳地望及相关地名示意图 (二)本文新解:淅川—商县说	181
图 10	古荆山(一)东侧面	195
图 11	古荆山(二)南面	195
图 12	古荆山(三)山势纵剖面图	195
图 13	古荆山(四)景山、沮漳上源及相关地名示意图	196
图 14	南漳县城附近的沮水(蛮河)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201
图 15	临沮(汉、六朝)漳乡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208
图 16	麦城、当阳(汉、六朝)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212
图 17	枝江、旌阳、编县、江津、那处、巴(巴丘、巴陵)、 涌水等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218
图 18	宜城县一带汉江洪泛区及有关古今地名位置示意图	279

图 19	古鄢水下游水道及古鄢都宜城、刘宋至北宋大堤城及相关地名位置图	281
图 20	宋元木渠与长渠位置	294
图 21	古沮、漳二水，郢都、江陵和古鄢都、宜城、中庐、 邳县，鄢、维、涑三水，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一)按流行说法	315
图 22	古沮、漳二水，郢都、江陵和古鄢都、宜城、中庐、 邳县，鄢、维、涑三水，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二)按本文新解	316
图 23	柏举、雍澨、大别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339
图 24	唐国、刘秀故乡及其他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339
图 25	吴楚柏举之战前后诸役地理形势略图	354
图 26	春秋吴师入郢之役形势略图 (一)吴、唐、蔡师入郢的军行路线及楚昭王奔随路线· 按流行说法	376
图 27	春秋吴师入郢之役形势略图 (一)吴、唐、蔡师入郢的军行路线及楚昭王奔随路线· 按本文新解	377
图 28	春秋吴师入郢之役形势略图(二) 秦师援楚及吴师东退的军行路线·按流行说法	378
图 29	春秋吴师入郢之役形势略图(二) 秦师援楚及吴师东退的军行路线·按本文新解	379
图 30	郢都、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略图	384
图 31	鱼复、朐臄、扞关位置示意图	428
图 32	楚皇城遗址、胡岗遗址及其他有关地名位置示意图	458
图 33	总图(一)按流行说法	插页
图 34	总图(二)按本书新解	插页

自序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本书共包括十三篇论文。主要内容是：探讨先秦至六朝以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为中心的古代荆楚地区历史地理问题。从探讨中，提出了不同于目前流行说法的一系列新解，即：楚国以及此后七百多年间直至梁陈之际的荆楚地区重心所在，乃应位于汉水中游地带，而非如隋唐以来千余年间逐渐形成体系的传统解释所云，在长江沿岸和江汉平原的水乡洼地。全部问题的关键尤在于作为楚国强大兴盛时期的著名都城——郢究竟在哪里？这是本书所要着力探索的中心问题。对此，我们得出的看法是：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应在今湖北宜城县南境、宜城平原上的楚皇城遗址；而不是像流行的说法那样，把郢都定在今江陵县北的“纪南城遗址”，并把秦汉以来的江陵城定在今江陵县城。根据史实，我们看到六朝时期的江陵城曾有三次向南迁动，前两次（孙吴和东晋时）南徙不远，仍未出今宜城县南境。第三次才远迁到长江边今江陵县址，时间在梁末（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初），西魏大军破江陵城，平毁之，尽掠居民入关中为奴，别建后梁附庸政权于另一个新的“江陵”城之际。此后，“江陵”城未闻再有移动，一直延续至今，又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古郢都、江陵是当时南方广大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与之相关联的大小城邑和山川湖泽很不少，例如：郢都之前的楚旧都丹阳，楚境著名的古荆山，流经郢都、江陵附近的古沮（雎）漳二水，战国时与

郢都经常并称的楚之陪都——鄢及其附近的鄢水(亦称夷水、蛮水),《史记·货殖列传》所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的云梦与巫、巴,位于古郢都、江陵以东的竟陵,与云梦相关联的古云杜、华容、编县、西陵,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相关地名,实际上也都在汉水中游,而不在长江两岸和江汉平原腹地。这也都是我们从原始材料入手,直探本源,进行有坚实依据的重新定位,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之后,所得出的足与古郢都、江陵相呼应、印证的新解。

新解如果勉能自立,古荆楚地区的历史地图将需重绘。这将有助于我们逐步树立起对这一地区全新的、更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也是更合理的空间观念,也为今后荆楚历史地理的进一步研究,打开新的途径。它至少将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对于古代楚国与后此的荆楚地区开发层次、区域特点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及其形成与转移位置等,逐次提供一些带规律性的新认识;(2)为今后江汉平原的开发利用问题,提供较坚实的、可以凭信的历史地理基础;(3)向考古界提供找寻楚文化考古更重要的基地,包括中心城市与楚王墓群所在(古夷陵当在今南漳县武安镇附近)的新线索;(4)对我国正在开展的地名学研究方面,提供一些历史时期地名随人迁徙所造成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等带规律性的认识。

本书之所以称为“新探”,意在申明:书中提出的看法虽有一系列创新之处,但总的说来,却仍在探索过程中,不敢说都已成熟,足为定论,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未解决的相关问题也还多,有些问题甚至目前在这本书中尚未触及,有待于今后通过进一步的努力,陆续提出配套的新解。现在先把这一部分研究成果拿出来,是为了借此引起注意与讨论。我衷心希望读者尤其同行们就以下三个层次,予以严格的审查:(1)我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信靠的?如有,请批驳。驳倒了,其他建基于此的新解也就站不住了。那就只有放弃自己的看法。(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我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有,也足以影响全局,甚至可以推翻新解,那就欢迎指出,并请见告:正确的理解应是什么?(3)如果我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比如:是否有片面性?是否有移

花接木现象？如然，正确地运用这条材料，应是怎样？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将可促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更加充实，并更增活力。

二、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说明

迄今为止，我对自己提出的新解是有信心的，而且日益增强。这并不是出于主观愿望，而是在探索中逐步树立起来的。一系列的新解都是积累了经过考订的原始材料之后，加以分析比较，找到了材料之间的内部联系，终于呈现出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最初往往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竟会是这样！但这又是无可否定的逻辑必然。只能沿着这条新辟的蹊径，按照科学的要求，继续走下去。眼前虽然途程并不平坦，却还未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这里，我愿先谈谈自己探讨、研究过程中所用的方法。

四十多年前，1944年春，我最初进入荆楚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时，本想只搞以郢都为中心的楚国地理问题；但具体着手之后，就发觉不能仅限于此，必须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后继城邑和相关的山川湖泽等相结合，一道解决才行。因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楚国地理，处处离不开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这些古注以及其他相关的地志、地记等都是用当时的地名来为楚国故地定位，因而我们也就必须同时对这些有关的汉魏六朝地名进行定位，弄清这些地名在今何处，然后才能进而论证当年楚地的今址。总之，在研究历史上的地名位置时，只要对某一地名的沿革关系（包括名称的变化与地名方位的移动）弄清楚了，就可以而且必须加以延伸，汇集不同时期的有关材料，前后互证，这样就可使古地名定位的依据更为充分。即以楚郢都为例：所有汉魏至齐梁的有关注释都认为楚郢都就是汉江陵城和魏晋宋齐梁时的纪南城（在当时江陵城稍北处），彼此间的沿革关系都很清楚，并无其他足以作出否证的材料。因此，要弄清楚郢都的地望，就必然也要连带弄清楚汉江陵城、六朝（下止梁末）的纪南城和江陵城地望。反之，要弄清汉魏

至齐梁时江陵城和纪南城地望，也必须联系先秦时期有关楚郢都的原始材料，这样才能较完整地把握史实，取得较确切的结果。

在研究探索过程中，我终于发现：在长江中游的古代荆楚地区范围内虽有不少个地名在《南齐书·州郡志》以前和《隋书·地理志》以后的许多古文献（特别是地志）中都有记载；但经过认真考订之后，却看出有不少都是同名而异地。大致说来，周、隋，特别是唐代以后直至近世的一系列有关史料中，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在齐、梁以前，上至两汉、先秦的一系列有关材料中，也可以找出明确的渊源线索。唯独《隋志》与《南齐志》之间，存在大片空白。偶有少量零散史料，也常衔接不上。问题在于梁、陈及北齐、北周诸史皆无地志。后梁是西魏、周、隋的附庸藩邦，图籍史册更少流传。《隋书》诸志虽曾以《五代史志》为名，单独成书，但其地理志还是以隋代的地理区划为主；其在荆楚地区范围内所记的梁、陈以及后梁、西魏、北周等辖区诸郡县的地理沿革和治所的迁动，往往很不完整，疏误亦多，常有模糊不清以至自相矛盾之处。后此的唐人著作，在注释前代地理时，也往往习惯于以唐代的州（郡）县和一些相关的山川城邑湖泽等的地望来解释、比附六朝时以及前此的同名故址。日久之后，约定俗成，竟被视为定论，但实际上却往往同汉魏六朝人（更接近于古代）的旧释很不一致，从而去史实更远。

为什么会如此？看来是由于梁、陈之际荆楚地区曾连遭战争的巨大破坏，从而地理区划上也相应地发生了大变动所致。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之乱”在南朝扩大，把萧梁王朝弄得四分五裂。此后不久，西魏宇文泰政权就乘机派遣杨忠等军南下，自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次年春就攻取了随郡、安陆、竟陵一带，尽有汉东之地。梁元帝承圣三年冬（公元554—555年初），西魏又派遣于谨等统率大军再次南下，攻破江陵，俘杀梁元帝，掠走十余万人口往关中为奴；随后豆卢宁等率军进据“江南”（此“江”非今之长江，而应是今蛮河，考见本书第一篇《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及末一篇《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的南平郡一带，又掠走大批人口。至此，荆楚地区的中心地带（汉水中游两岸河谷平原）除襄阳

附近外，皆大遭破坏。同时，西魏—北周又把原据有襄阳一带，因与梁元帝对立而投附过来的萧督集团南迁到长江边今江陵一带，建立后梁小朝廷，而把襄阳据为己有，作为其南境江汉地区的军政中心所在，以取代已遭废毁的故江陵城的地位。此后，长江以北、广大荆楚地区的地理区划，州、郡、县名称，也就相应地被新统治者作了大量的调整、归并和改名、迁址。同样，后梁和南朝新建立的陈王朝在重定疆域、调整政区之时（南北双方基本上以长江为界），其州郡县的建置和设治地点也多有变化，地名随人迁徙的侨立州郡县又出现不少（但已不再称为侨州郡县）。结果就使原在汉水流域的一系列地名南移到长江边新址，形成了隋唐统一后江汉地区的州（郡）^①县新布局。这期间政区的具体变迁经过，由于史料缺乏，现已无法详悉，但是从《南齐志》以前、《隋志》以后的两段地志所记同名诸地的方位之显著差异，与这两段之间地理沿革的断线情况，可以推知：这一巨大变化必然发生于梁陈之际（公元555年后），本地区遭受大破坏，政局形势全异之后。

现今的流行说法关于古代荆楚地名定位的主要凭借，是唐宋以来直至明清的历代注释，而关键尤在于依据张守节（盛唐开元时人）《史记正义》中转引唐初贞观年间成书的《括地志》而定楚郢都在今江陵县北的“纪南城”遗址^②；并以此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以配套的地名定位为基础的流行说法。而这种说法无论在史料依据上，还是从科学规律上看，都存在着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題。〔案：干宝《搜神记》云：“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卧处北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获免主人大难……闻于太守，太守悯之……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塚，高十余丈……”汪绍楹校注：“本条

① 隋唐宋七百年间的政区制度是州郡合一制，初期有时称州，有时称郡。中唐以后，二者兼用并行，通称某州某某郡。

② 泉按：此“纪南城”之得名，当与今江陵县同步或稍晚，在后梁建国以后。应也是地名随人搬家的结果之一，并非屡见于六朝齐梁以前记载中作为楚郢都、汉江陵城迁址后的故墟古纪南城。考详本书末篇《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

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对比之下,本书则主要凭用先秦原始材料及汉魏六朝(至梁末)的诸家古注,并结合部分唐宋以来的、与现今流行说法不合、却与齐梁以前记载可以相证的材料,加以分析、考订,从而得出与流行说法截然不同的新解。新解澄清了原始材料方面受到的千年障蔽,显示出六朝梁末以前一系列古记载之间彼此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而唐宋以来的诸多矛盾混乱的地名定位注释,在还它本来面目之后,也就各得其所。从新解清理出的一系列史实真相,反映了近乎原貌的古代荆楚地理状况。

但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相关的重要史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即:著名的《水经注》也是齐梁时(北魏后期)的地理著作(其所引《经》文则还要早到汉魏时),但其中却有不少关于荆楚地名位置的记载,同汉魏六朝时的其他记载不合,而与唐宋以后的流行说法倒是相符,并经常被流行说法引为依据,这又该如何看待?

对此,首先应指出:现存诸版本的《水经注》久已非本来面目,而是先已散乱残佚,后经唐宋以至明清的历代文人、学者多次进行了加工整理及订补之后,才成为今貌。这些“订补”虽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贡献,但因其多据后世的地理观念,以致改得反而失真之处,也所在多有;而尤以梁陈之际经过大动乱、政区多有变易的荆楚地区有关地名方位为然。至今,内容紊乱费解以至有明显错误未得订正之处,仍屡见不鲜,使人不能笼统凭信。此外,也还有些后世之人在原书正文之旁随手作注,被其他人辗转抄刻时,误窜入正文,遂致又增失误。加之郦道元是北方人,从未到过南方,亦常不免有隔阂、误解之处。这些方面的具体例证,散见于本书诸篇论文中,请参阅。

但《水经注》又是一部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的、价值极高的地理名著。我们对它既需高度重视,却又不能不慎重鉴别,力求去伪存真之后,才敢放手引用,作为重要依据。因此,本书的各篇论文中对待今本《水经注》的原则是:只取其能与齐梁以前其他较可靠的古记载相印证(至少不相矛盾)的部分;而对其中与同时代及前此的其他可靠记载不一致处(这种地方往往也正同《水经注》中的其他部分有矛盾,而这些其他部分却又同齐梁以前较可靠的记载可以相合),则宁